

理性至上抑或立場先行？ ——中國網民的信息認知能力與輿論態度

● 馬得勇

摘要：信息認知能力是公民素養的核心組成部分，是一個國家形成良好輿論場域的保障。本文以網民調查為依據，對中國民眾的信息認知能力進行了實證分析。研究首先界定了信息認知能力的內涵，並從價值和事實兩個維度開發出了測量信息認知能力的類型學指標，對普通網民的信息認知能力進行了量化分析。統計結果顯示，約有三成左右的中國網民在信息認知方面存在價值偏好和現實選擇之間的不一致。信息認知不一致者和一致者在職業分布、教育背景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異。在信息獲取渠道的異質性、信息透明度、信息品質、媒體政策、外交糾紛、香港問題等議題上，認知不一致者和一致者均存在非常明顯的差異，但是在網絡輿論參與度和信息傳播上不存在顯著差異。根據分析結果，本文指出中國網民的信息認知能力仍顯不足，這將阻礙網絡輿論的健康發展。

關鍵詞：信息認知 認知不一致/一致 信息獲取 輿論態度 中國網民

一 引言

現代社會中，大部分民眾對於外部世界和政治領域的了解依賴於包括新聞媒體在內的各種二手信息。然而，對於這些信息的真實性、客觀性的認知，以及基於這些信息所給出的輿論意見，不同的個體卻存在極大差別。李普曼 (Walter Lippmann) 早已指出，公眾對世界的了解大部分通過媒體，而媒體可以通過議程設置 (agenda-setting)、信息框架化 (framing) 等手法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他們眼中的外部世界^①。因此，即使是以真實、客觀、理性等新

* 本文為「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成果(項目名稱：政治心理學視野下的政治傳播研究；項目號：2020030012)。

聞專業主義價值為優先原則的媒體進行報導時，也往往或多或少帶有某種傾向性，很難做到完全真實和客觀，遑論那些以政治立場為優先原則的媒體。因此，有人戲稱：「不看新聞脫離社會，看新聞脫離真相！」在這樣一個嚴重依賴二手信息了解和認知世界的時代，如果想盡可能客觀地了解事實和真相，那麼公眾在接收信息時就必須具備一定的信息認知能力。個體的信息認知能力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公眾接收、分析和接受何種信息，並進而影響其對現實政治、社會問題、輿論議題的理解、評判以及參政能力。反過來，如果公民對新聞信息的真偽沒有能力分辨，對政治社會問題缺乏深刻的理解，那麼他們不但沒有能力維護自身的偏好和權益，而且很可能會輕易被各種社會政治精英、媒體或者當權者的話語所蠱惑和利用，成為危害民主制度運行、損害他人和國家利益的幫兇。

個體有無能力接觸政治信息，並在接觸到各種不同屬性和立場的政治信息後如何評估，最後做出決策和表達意見？對於這些方面，國外已經有不少研究成果。中國在政治體制上與西方國家存在很大差別，這種體制下的民眾在政治、新聞等信息的認知上存在何種特點？是否存在認知能力不足的問題？如果存在，原因是甚麼？為了了解國內在此問題上的研究現狀，我們查詢了「中國知網」上的所有學術類期刊，但遺憾的是，我們沒有發現一篇論文對這一問題做過哪怕是純粹的理論性探討，遑論實證性的研究。為此，本研究將聚焦於中國民眾的信息認知一致/不一致的問題，通過問卷調查收集普通網民在信息認知方面的情況，在此基礎上展開分析。通過這一探索性分析，本文希望能夠初步揭示中國民眾在信息認知方面的社會人口學特徵、不同認知水平的民眾在政治社會議題上的態度差異，為進一步的研究打下基礎。

二 認知能力與信息認知能力

公民素養 (citizen competence) 基於公民對政治的理解和評判能力，即政治認知能力 (political cognitive ability)，常常被表述為「政治練達」 (political sophistication)、「政治知識」 (political knowledge)、「政治意識」 (political awareness) ②。政治認知能力又以一般的認知能力為基礎。認知能力指人腦加工、儲存和提取信息的能力，是個體對事物的構成、性能、與他物的關係、發展的動力、發展方向以及基本規律的把握能力，是個體成功完成活動最重要的心智條件。邏輯推理能力是個體認知能力中最基礎和最重要的要素，但認知能力並不僅限於邏輯推理能力。在社會政治領域，邏輯推理能力也是人們保證正常生活所必需的認識和判斷事物的基本生存技能，是人類理性的重要體現。個體在對信息的認知上遵循基本的邏輯和推理規則。例如，當看到「戴安娜王妃自導自演了自己的死，其實她還活着」的消息和「英國軍情六處策劃了這起車禍，目的是要置戴安娜於死地」的消息時，認為只可能有一個消息是真的或者兩個消息都可能是假的人，在認知能力上顯然要高於那種同時認為這兩個消息都是真的人。又如，在社會福利政策問題上，如果存在增加普

通民眾的福利和削減福利兩種意見，從包括支持和反對在內的各個方面了解這一政策的來龍去脈要比僅從一個相關方了解信息，更有可能全面理解問題的本質和癥結所在，因為幾乎在所有的社會，「兼聽」已經被證明為最有可能了解真相的方法，「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既是常識也符合邏輯。因此，從信息接收的角度看，個體選擇從多渠道、多方位了解相關事件顯然要比只選擇從一個渠道了解相關事件更符合邏輯，其對信息的認知能力也更高。

然而，人們在思考和行動時並不總是合乎邏輯和理性的。事實上，同一個體的偏好和選擇相互矛盾、觀點上不合邏輯的現象在日常生活中經常發生。例如，一個正在減肥的人看到自己想吃的食物時經常會忍不住去吃；一個明明知道抽煙對身體有害的人卻仍然選擇抽煙；當一位教徒相信世界末日會在某天到來的預言但那天世界末日並未發生時，他仍然相信世界末日的教義。由於政治經濟社會問題更為複雜，因此對這些問題的系統性認知需要接受專業的教育和培訓，也需要個體具有更強的思辨和觀察能力。但是，普通民眾往往並不具備這種能力，因而更容易產生認知上的矛盾和混亂。例如，很多人會認為經濟上的市場化與政治上的集權可以同時並存，因此會認為中國共產黨在包括私企、外企在內的各類企業中建立黨組織、加強黨對企業的領導，與實行市場經濟體制並無衝突；但是具備一定政治經濟學專業知識者，則很容易會發現兩者遵循明顯不同的邏輯，無法長期並存。

在知識和信息空前發達的當今社會，面對複雜的政治世界和良莠不齊、真假難辨的海量信息，公眾在信息的接收、選擇和分析上的能力就顯得極為重要。有研究顯示，政治上更為成熟的公民在接觸信息時會對信息進行分析辨別，並且更加關注信息來源的可靠性^③。信息認知能力必然遵循基本的認知規律。在信息認知過程中能否借助邏輯思維，依據個體自身既定的偏好和信念對海量信息進行篩選，是個體信息認知能力高低的最為重要的體現。個體所持有的價值和信念是自身真實偏好和利益的體現，如果個體不能按照自身的偏好和信念來接收信息和選擇信息渠道，那麼他將很容易被隱含着他人偏好和利益的信息所誤導，使得自己持有的信念和實際行為相背離。信息認知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個體是否有能力按照自身利益和價值對政治、政策和輿論做出正確判斷和提供意見。因此，本研究認為對公眾信息認知能力的考察，首先要從了解個體在信息認知中的邏輯推理能力開始。

三 研究設計

儘管心理學界在一般的認知能力測量上已經積累了成熟的方法^④，但是在政治認知能力的測量上爭議較多，而專門對個體信息認知能力的測量則仍未開發。以美國學界為例，與政治認知能力相關的概念很多，如前述的公民能力或公民素養、政治意識、政治知識、政治練達，等等。對這些概念的測量也較為混亂，經常出現的情形是不同學者往往使用不同的概念，但實際的測量指標卻使用同一套體系，或者將不同的測量指標應用於測量同一概念。

為了降低研究的難度，本研究只對信息認知能力而不對政治認知能力進行測量。

(一) 信息認知測量：認知一致/不一致

我們認為，在信息認知過程中，個體能否保持理想價值和現實選擇的一致性是其信息認知能力的重要體現：在接收信息時堅持的理想價值和現實選擇之間的一致性程度愈高，表明在信息獲取和分辨方面的邏輯分析能力愈強；不一致程度愈高，也即認知混亂，表明在信息獲取和分辨方面的邏輯分析能力愈弱。能否保持邏輯一致並不是全面衡量個體信息認知能力的綜合性指標，但卻是最基本指標，因此本研究首先通過了解信息認知中的邏輯推理能力來測量個體的信息認知能力。

不同的人在接收信息時可能存在完全不同甚至彼此衝突的價值原則。同一個體在接收信息時也可能同時存在兩種不同的價值偏好，當這些價值偏好發生衝突時，就需要在不同價值之間權衡取捨，排列出優先順序，在兩者之間做出選擇。在認知一致的情況下，個體將優先按照某一價值原則選擇信息的獲取渠道和信息本身。例如，在如何保證信息的客觀性和真實性這個問題上，個體如果堅持媒體必須保持獨立性，那麼合理的推論就是，他在實際接收信息時應該選擇獨立性較高的信息來源或媒體，而不是選擇不具備獨立地位的信息來源，這樣才與其價值理念相一致。如果他一方面秉持媒體獨立的價值，但在現實中又選擇了不具備獨立地位的信息來源，那麼就表明他在信息認知中出現了混亂。顯然，在信息認知上能夠保持一致的人比不一致的人具有更高的信息認知能力，也更有能力對輿論和政治議題做出符合自身利益或者價值偏好的判斷。因此，信息認知能力的測量可以簡化為四種情況，其中兩種情況屬於認知一致，兩種屬於認知不一致或認知混亂(表1)。

表1 信息認知的價值原則與現實選擇

		價值原則	
		原則1	原則2
現實選擇	依據原則1選擇	一致	不一致(混亂)
	依據原則2選擇	不一致(混亂)	一致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下同。

在信息獲取的價值原則上，我們假定每個人都希望獲得真實的信息。如果個體不希望獲得真實的信息，那麼他完全可以不去花時間瀏覽各類新聞，只需要自己臆想就可以了——這是一種不合邏輯的事情。那麼媒體是否應該以客觀真實地傳播信息為己任呢？至少從一些媒體人的角度來看是理所當然的^⑤。首先，媒體自主性被認為是保證新聞信息客觀真實的前提條件，而新聞媒體在報導中能否堅持新聞專業主義——真實、客觀、理性等原則，則是保證信息真實性的必備要素。當然，並非所有人都同意這兩個價值原則；新

聞報導也絕非具備這兩個條件就能夠做到完全真實可靠。但是，至少從理論上來，一個自主的媒體要比一個依附於某個政治或經濟利益集團的媒體更有可能真實地報導新聞；一個追求專業主義的媒體比拒斥專業主義的媒體更有可能真實地報導新聞。關於媒體的專業性，國內媒體一直存在着專業主義和政治立場之間的緊張關係，以及「紅」與「專」經常難以兩全的局面。關於這一問題，黨和政府一直強調「黨管媒體」的原則^⑥，但是對這一問題存在着不同觀點，一部分人支持媒體服從黨的領導，一部分人則強調媒體的專業主義優先。

在現實中，中國民眾在接觸信息時也存在着至少三種選擇：一、官方媒體，比如中央電視台及其微博、微信賬號；二、微博、微信等不屬於官方媒體的商業性媒體；三、境外媒體。在中國，官方媒體作為黨的「喉舌」，由於承擔着宣傳黨的方針、政策的使命，始終堅持並服從於黨的領導，因此在信息的同質性方面也更高；那些商業化程度較高的傳統媒體，以及微博、微信等新媒體儘管受到政府的管控，但相對官方媒體而言信息更為多元，異質性也更高；而境外媒體相比境內媒體而言，異質性更高。一部分中國民眾會選擇同質性高的信息渠道，比如從官方的電視台、電台和紙媒中了解信息，而有的人則會選擇從更為多元和與官方信息異質性高的微信、微博甚至境外媒體來了解信息。

不難發現，黨管媒體和新聞專業主義之間始終存在一種緊張關係，黨對媒體的過多干預和直接管理可能會削弱媒體對新聞專業主義的追求。從受眾的視角看，如果個體堅持新聞專業主義的價值原則，那麼合理的推論就是 he 會反對黨管媒體的政策。如果個體在堅持新聞專業主義的同時又支持黨管媒體，那麼就會在邏輯上陷入矛盾——信息認知混亂或認知不一致。同理，如果個體在價值上支持媒體的政治性優先，即媒體首先要服從黨的領導、反映黨的立場，但同時又反對黨管媒體的政策，那麼也會陷入邏輯矛盾和認知不一致。

因此，我們確立了信息認知中的兩個價值原則：第一，是否支持媒體的獨立地位；第二，支持媒體的專業性優先還是政治性優先。同時，我們也選定了兩個指標來測量個體在信息認知中的現實選擇，第一，獲取信息的渠道的同質性/異質性；第二，對現實新聞媒體政策的支持/反對態度。根據兩個價值原則和兩個現實選擇，我們可以羅列出八種認知一致或不一致的類型，這八種類型又可簡化為兩種認知不一致和兩種認知一致的類型（表2）。

表2 信息認知能力測量

指標A		獲取真實信息的前提條件		指標B		媒體優先堅持的價值原則	
		媒體獨立	媒體不獨立			專業性	政治性
實際信息渠道屬性	一元	認知不一致 1型	認知一致 2型	實際媒體政策偏好	支持黨管媒體	認知不一致 1型	認知一致 2型
	多元	認知一致 1型	認知不一致 2型		不支持黨管媒體	認知一致 1型	認知不一致 2型

眾所周知，諸如微博、微信以及其他商業化程度較高的媒體和境外媒體在信息的異質性方面要遠高於官方媒體。當個體在價值層面上認為真實信息的獲取有賴於媒體獨立，但在實際的信息渠道選擇上，又優先選擇從信息同質性很高的官方媒體獲取信息時，就產生了信息認知上的矛盾（「認知不一致1型」）。反之，認為信息的真實性不依賴於媒體獨立，也即贊成媒體應該從屬於某個利益集團或政治組織的同時，又優先選擇從信息異質性高的微博、微信和境外媒體來獲取信息，同樣也產生了信息認知上的矛盾（「認知不一致2型」）。這種矛盾狀態看起來在邏輯上更加荒謬，但理論上仍然存在。同理，如果支持媒體獨立的價值，同時也優先從微博、微信和境外媒體獲取信息，那麼個體在信息認知上就是一致的（「認知一致1型」）；如果在價值層面上不支持媒體獨立，同時也優先從官方媒體獲取信息，那麼個體在信息認知上也是一致的（「認知一致2型」）。

依據獲取真實信息依賴於媒體的獨立與否和現實的信息渠道選擇，我們在對中國網民的問卷調查中設計了如下問題：

問題1：在下面兩個原則裏，你覺得新聞媒體堅持哪個原則更有可能保證新聞報導的客觀和真實？

備選項：1=新聞媒體保持獨立性，不從屬於任何政黨或利益集團；2=新聞媒體從屬於某個政黨或利益集團。

問題2：當事實或真相本身存在很大爭議時，以下兩種方式相比較而言，你覺得哪種方式更有可能了解到事實真相？

備選項：1=盡可能多地從不同渠道和不同立場的媒體了解信息，例如個人微博微信、境外媒體等；2=從我國的官方權威媒體了解信息，例如央視、《人民日報》、新華社。

以上兩個問題構成了測量指標A（表2），旨在測試民眾在如何獲取真實信息方面的價值取向和實際的信息獲取途徑選擇之間的認知一致或不一致狀況。這些題目的選項設計並非為了全面了解被訪者在這方面的觀點，而旨在測試在獲取信息上，當面對兩種乃至更多完全不同的價值偏好時，個人的價值偏好的優先性，而非其在信息獲取時秉持的所有價值偏好。

如前所述，在媒體報導的價值原則上，存在着新聞專業主義（真實、客觀、理性等）和政治性（媒體報導與黨的立場保持一致）何者優先的問題。在現實的媒體政策上，也存在着是否支持黨管媒體的觀點差異。因此，信息認知能力也表現在媒體報導的優先價值原則與是否支持黨管媒體政策出現一致或者不一致的問題。如果個體在媒體報導的價值原則上堅持專業性優先，但在實際的媒體政策上選擇支持黨管媒體，那麼就出現了信息認知矛盾（「認知不一致1型」）；如果堅持專業性優先的同時在媒體政策上也反對黨管媒體，那麼在認知上就是一致的（「認知一致1型」）。如果個體在媒體報導的價值原則上堅持政治性優先的同時反對黨管媒體的政策，那麼就出現了認知矛盾（「認知

不一致2型」)；如果在媒體報導上堅持政治性優先原則的同時也支持黨管媒體的政策，那麼在認知上就是一致的(「認知一致2型」)。儘管「認知不一致2型」在邏輯上更為荒謬，但現實中仍然可能存在。

依據新聞媒體的專業性和政治性的價值原則和現實的媒體政策選擇，我們在問卷調查中設計了如下問題：

問題3：在新聞報導中，媒體往往面臨着專業性(及時、中立、客觀、真實等)和政治性(與黨的立場保持一致)的兩難選擇。請問你覺得一份高品質的媒體，如果兩者發生衝突，應該優先堅持哪個原則？

備選項：1=專業性優先；2=政治性優先。

問題4：請問你對下面這句話的態度是？「新聞輿論工作最根本的是堅持中國共產黨對新聞媒體的絕對領導，做到『黨媒姓黨』」。

備選項：1=非常反對；2=反對；3=中立；4=贊同；5=非常贊同(為了簡化分析，我們將選項再編碼為「反對」、「中立」和「贊同」)。

以上兩個問題構成了指標B(表2)，旨在測量民眾在媒體專業性價值和現實的媒體政策選擇方面的認知一致或不一致狀況。相較於指標B，指標A的測量更為隱蔽，不易為被訪者所識別。

(二) 調查執行

本研究選擇成本相對低廉的網絡調查方式，以中國的普通網民作為調查對象。除了成本的考慮，我們還認為中國網民在輿論塑造和信息傳播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對他們的研究將有助於了解中國輿論的形成機制。

調查共進行了兩次：2019年10至11月為第一階段調查，共收集4,882份樣本；2020年1至2月，在修改了第一階段問卷的基礎上開展了第二次調查，共收集2,028份樣本，兩次調查共收集到6,910份樣本。這些樣本的收集方式主要有兩種：一是由某網絡調查公司負責向其用戶推送，此部分為付費樣本，共收集1,134份；二是通過微信朋友圈、微信群、新浪微博發放問卷，共收集5,776份。這些樣本的人口學特徵如下：男女比例：55.8比44.2；年齡段分布比例：18至29歲為57.06%，30至39歲為30.2%，40至49歲為9.3%，50至59歲為2.97%，60歲及以上為0.48%；教育程度比例：初中及以下為4.14%，高中為40.67%，本科及專科為40.04%，碩士及以上為10.16%；職業分布比例：工人、農民為9.43%，政府機構為17.11%，企業職員為29.66%，新聞、律師、文化及自由職業領域為17.7%，事業單位(中小學校、醫院、文化衛生等)為5.67%，大學教師為4.73%，大學生為15.73%。

在問題的先後順序上，我們首先放置了測量被訪者在新聞和信息獲取方面的價值傾向，然後放置了測量被訪者在實際信息獲取中的選擇。為了更加真實地測量個體在信息認知上的邏輯，我們將這些題目分散放入問卷中，每

個題目中間都加插了其他一些問題，並且這些問題不會同時出現在同一個答題頁面上（即分頁顯示），以便使被訪者在沒有意識到題目之間的邏輯關係的情況下根據自身的偏好做出選擇。這樣設置是為了盡可能減少被訪者在回答問題時因題目相鄰太近而意識到自己的回答出現了自相矛盾的情況，然後重新修改答題選項，因為當被訪者意識到自己的回答出現自相矛盾時，存在為了維護自己的認知一致性而改變其原初觀點和想法的動機^⑦。此外，我們還設置了最短答題時間，以防答題者不看問卷而胡亂選擇答案的情形（刷題）出現。通過微信渠道收集的問卷，設置紅包的抽中概率為50%，每個紅包2元人民幣左右，以保證答題者不會為了紅包而刷題。本研究委託的網絡調查公司對註冊用戶有專門的用戶信用考核系統，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避免答題者隨意刷題的情況。

四 分析結果

（一）信息認知基本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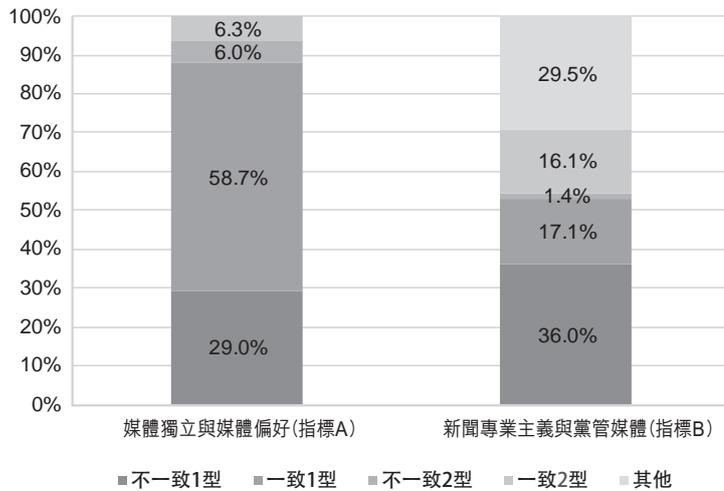
首先，我們對上述四種測量方法得到的統計結果予以展示。從價值層面來看，贊成媒體獨立是保證信息客觀真實的條件（問題1）這一觀點的網民比例達到87.7%，認為媒體應該從屬於某個政黨或利益集團的比例只有12.3%。當被問及專業性和政治性發生衝突時新聞媒體優先堅持哪個原則才能保證做出客觀真實可靠的報導（問題3），有77%的網民選擇了專業性優先，只有23%的網民選擇了政治性優先。從上面兩個問題可以看出，大部分網民更傾向於媒體獨立和專業性優先的價值取向。

當被問及在事實或真相本身存在很大爭議時，哪種方式更有可能了解到事實真相（問題2），有35.3%的網民選擇從官方媒體了解，64.7%的網民選擇盡可能多地從不同渠道和不同立場的媒體了解信息。當被問及對新聞輿論工作最根本的是堅持中國共產黨對新聞媒體的絕對領導（問題4）這一媒體政策的態度時，有18.4%的網民持反對態度，31.6%的網民持中立（或「不知道」）的態度，49.9%的網民持贊同態度。從這兩個問題的調查結果來看，網民在實際的信息選擇渠道和媒體政策上表現出了更多的平衡性或者說意見分歧，而非像價值層面那樣呈一邊倒局面。

從統計結果可以看到，依據指標A，網民「認知不一致1型」的比例是29.0%，「認知一致1型」的比例是58.7%，「認知不一致2型」的比例是6%，「認知一致2型」的比例是6.3%。從指標B來看，「認知不一致1型」的比例是36.0%，「認知一致1型」的比例是17.1%，「認知不一致2型」的比例是1.4%，「認知一致2型」的比例是16.1%，另有29.5%不屬於四種類型的任何一種（圖1）。

由此可見，「認知不一致1型」和「認知一致1型」在全體網民中的比例較高，而「認知不一致2型」和「認知一致2型」在全體網民中的比例較低。為了

圖 1 信息認知現狀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統計結果繪製，下同。

說明：在黨管媒體的態度調查中包含「中立」項，「中立」項與新聞價值原則的交互項既不屬於認知不一致，也不屬於認知一致，故將其劃為「其他」；樣本數為6,9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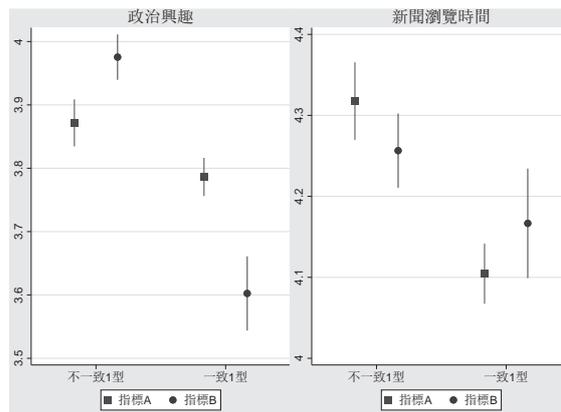
集中分析第1種類型的認知不一致/一致，後面將不再對第2種類型的認知不一致/一致進行分析。如無特別說明，本文後半部分均以第1種類型的認知不一致/一致樣本為分析對象。

就社會人口學的特徵而言，以指標A為依據，從受訪者的職業分布來看，大學教師在所有職業中認知不一致的比例是最低的；以指標B為依據，新聞、律師、自由職業、事業單位、大學教師和大學生的認知不一致比例相對較低。從年齡分布來看，各年齡段在指標A上不存在統計上的顯著差異；在指標B上出現了「倒U型」分布——「70後」、「80後」世代認知不一致比例較高，「90後」、「60後」世代認知不一致較低的情況，「50後」由於樣本均值偏差較大，與其他世代不存在明顯差別。從教育程度來看，指標A顯示，教育程度在碩士及以上者，認知不一致比例明顯低於大學及以下教育程度者，此差異具備統計上的顯著性，而大學及以下教育程度者彼此之間的不一致比例差異不具備統計上的顯著性；指標B則顯示教育程度與認知不一致之間不存在明顯的相關關係。綜合來看，教育與認知不一致之間的關係需要進一步研究。我們對大學及以上教育程度者的專業類型作出分析後發現，指標A的統計結果均顯示，人文社科類專業背景的被訪者在信息問題上的認知不一致比例明顯低於理工農醫科，但指標B的統計結果則顯示文科和理科差別不明顯。總體來看，教育程度在碩士及以上者、職業為大學教師的群體在信息認知能力上更高，但與年齡的關係不明顯。

(二) 政治興趣、政治討論與信息認知

政治興趣是人們參與政治和輿論討論的一個基本條件。政治興趣有可能成為培養信息認知能力的一個心理動機，但事實是否如此需要通過實證的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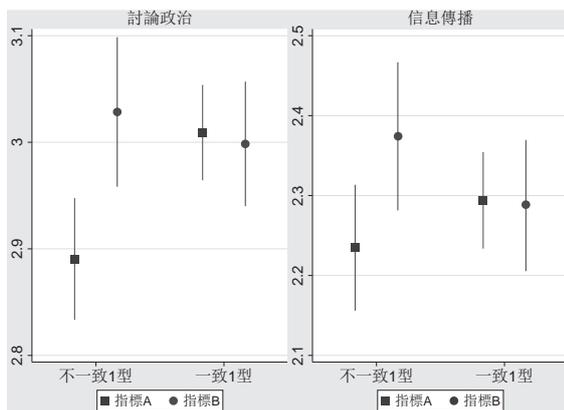
圖2 政治興趣、新聞瀏覽時間與信息認知



說明：關於政治興趣的原始問題為：「總體來說，你對政治類新聞感興趣嗎？」備選項：1=完全沒興趣；2=不太感興趣；3=一般；4=比較有興趣；5=非常感興趣。關於瀏覽新聞時間的原始問題為：「你瀏覽時事政治類新聞的時間大概是多久？」備選項：1=從來不看；2=每個月看1-2次；3=每個月看幾次；4=每周看幾次；5=幾乎每天都看；6=每天至少1小時以上。樣本數為6,910。

新聞的次數為1至2次，14.49%的網民表示一個月看幾次，27.58%的網民表示每周看幾次，36.45%的網民表示每天都看，而9.62%的網民表示每天收看新聞的時間超過一小時（圖2）。比較認知不一致者與一致者收看新聞的均值，發現認知不一致者比一致者的新聞瀏覽時間更多。

圖3 政治討論、網絡參與與信息認知



說明：關於討論政治的原始問題為：「請問你經常和朋友在日常閒談或者微信、電話等網絡溝通渠道中談論政治問題嗎？」備選項：1=從來不談；2=幾乎不談；3=有時候會談一下；4=經常討論；5=幾乎每天都討論。關於信息傳播的原始問題為：「請問你在瀏覽新聞、微博或微信朋友圈各種各樣的消息、知識性文章或帖子時經常發表評論、留言或者轉發嗎？」備選項：1=幾乎不評論和留言；2=偶爾會；3=看情況，有時候會有時不會；4=經常評論、留言和轉發；5=幾乎都會評論、留言或轉發。此數據僅限於2020年開展的調查，樣本數為2,028。

驗。為此，我們設計了四個問題作為網民在政治興趣方面的測量指標。當被問及政治興趣時，有9.44%的網民表示對政治沒興趣（圖2備選項1、2合併結果），22.27%的網民表示一般，68.29%的網民表示有興趣（圖2備選項4、5合併結果）。總體而言，網民對政治的興趣較高。但是，比較認知不一致者和一致者的興趣均值，則發現認知不一致者對政治事務更加關心。當被問及瀏覽時事新聞的頻率時，有1.75%的網民表示從來不看，10.1%的網民表示一個月收看政治新聞

當被問及會否和朋友在日常閒談或者微信、電話等網絡溝通渠道中談論政治問題時，有21.75%的網民表示幾乎或從來不討論政治，58.48%的網民表示有時會討論，17.32%的網民表示經常討論，2.47%的網民表示每天都討論。比較認知不一致者與一致者的討論均值，發現指標A上不一致者低於一致者，指標B上兩者不存在差別。當被問及會否對消息、知識性文章或帖子經常發表評論、留言或者轉發，有28.65%的網民回答幾乎不評論或留言，25.74%的網民表示偶爾會留言，34.27%的網民表示看情況，10.11%的網民表示經常評論、留言和轉發，1.23%的網民表示幾乎都會評論、留言或轉發。比較認知不一致者與一致者的信息傳播均值，發現在兩個指標上兩個群組均不存在統計上的顯著差異（圖3）。

綜合以上四個問題的分析結果可以看到，信息認知水平低的網民群體在政治興趣和新聞瀏覽方面不但不比認知水平高的群體低，反而可能更高，這也意味着信息認知水平的低下並沒有阻礙

認知不一致者接觸新聞信息。在政治信息的傳播和輿論塑造方面，信息認知水平低的群體則與認知水平高的群體不相上下。

(三) 信息獲取渠道與信息認知

信息透明與否是信息本身品質優劣的一個衡量標準，也是人們獲取信息時比較關注的一個方面。為此，我們考察了認知不一致者和一致者在信息透明度方面的感受。當被問及國內新聞信息是否透明時，根據統計結果，28.3%的被訪者認為信息不透明，30.47%的被訪者認為一半一半，41.22%的被訪者認為信息透明。從認知不一致者與一致者在信息透明度的均值分布可以看到(圖4)，兩者在這一問題上的態度差異非常大，認知一致者認為目前國內的信息很不透明，而認知不一致者則認為比較透明。這一結果體現出不一致者對於信息透明與否並不特別在意，而一致者的要求更高，因而對信息透明現狀持更加批判的態度。

為了了解信息認知一致者和不一致者的信息獲取渠道，我們對被訪者的信息獲取途徑進行了調查，然後對這些信息獲取途徑進行了因數分析，發現存在三種主要的獲取渠道：(1) 通過電視台、電台、報紙、手機應用程式 (APP)、門戶網站獲取信息；(2) 通過微信、微博獲取信息；(3) 通過境外媒體獲取信息。從獲取渠道來看，這三類渠道在信息屬性的異質性上存在差別。為此，本研究採取了如下的測量方法來對信息的異質性進行測量：通過電視台、電台、報紙、手機APP、門戶網站中任何一個渠道獲取信息者，設為異質性低的信息渠道，權重為1，因為這些渠道的信息同質性高，並與官方立場保持較高的一致性；通過微信、微博任何一個渠道獲取信息者，設為異質性中等的信息渠道，權重為2；通過各種境外媒體獲取信息者，設為異質性高的信息渠道，權重為3。然後，三種渠道加總後所得分數作為異質性高低的分值(分布在0至6之間)。統計分析發現，信息認知不一致者更喜歡從異質性低的新聞媒體獲取信息(圖5)。

圖4 信息透明度與信息認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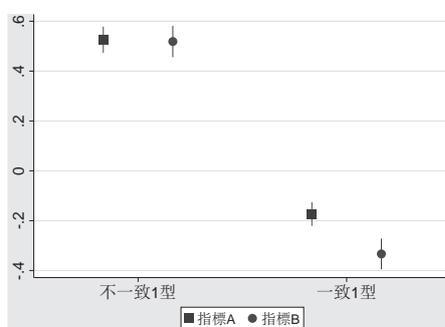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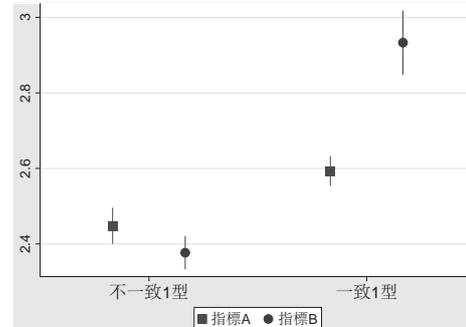


圖5 獲取信息渠道異質性與信息認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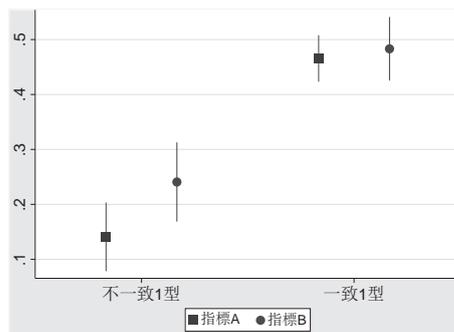


說明：關於信息透明度的原始問題為：「有關國內政治或政府方面的新聞信息，你認為相關信息是不是很透明？」備選項：-1=不透明；0=一半一半；1=透明。關於獲取信息渠道的原始問題為：「在下面這些新聞信息獲取的渠道中，你經常使用的有哪幾個渠道？(可多選)」備選項共有「國內門戶網站」、「國內電視台」、「新浪微博」、「境外媒體」等十個選項。圖4樣本數為2,028，圖5樣本數為6,910。

新聞媒體在信息傳播中經常使用議程設置和框架化來影響受眾對輿論議題的關注和議題屬性的判斷^⑧。為此，我們設置了兩個問題來調查中國網民的看法。當被問及日常人們所接觸的信息是否都是被包裝和改編之後的信息時，同意的比例為51.38%，不同意的比例為18.39%，中立態度佔比30.23%。比較認知不一致者與一致者的態度均值（圖6），可以看到，網民總體上同意媒體信息被框架化的觀點。但是認知不一致者同意這一觀點的比例遠低於認知一致者，這也體現出認知一致者對媒體信息的理解要更為深刻，對信息傳播現狀持更為批判的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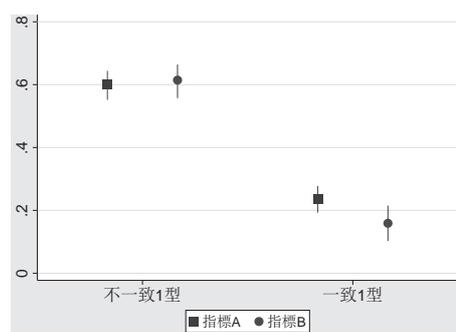
當被要求對國內新聞信息的價值進行評價時，有51.04%的網民認為有價值，11.83%的網民認為沒有價值，31.73%的網民認為一半一半。可以看到，儘管新媒體的發展為人們帶來了海量信息，但對於目前新聞信息的品質，中國網民的評價並不算高。比較認知不一致者與一致者的態度均值，會發現認知一致者對信息的品質評價要明顯低於不一致者（圖7）。

圖6 框架感知與信息認知



說明：關於框架化信息的原始問題為：「今天，人們愈來愈依靠各種媒體來了解世界上發生的事情。但是，有一種觀點認為普通公眾聽到、看到、讀到的消息，都是被精心挑選、改編和包裝之後的。人們很難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到底是甚麼。對這一觀點你的態度是？」備選項：-1=不同意；0=一半一半；1=同意。圖中為均值，樣本數為6,910。

圖7 信息品質感知與信息認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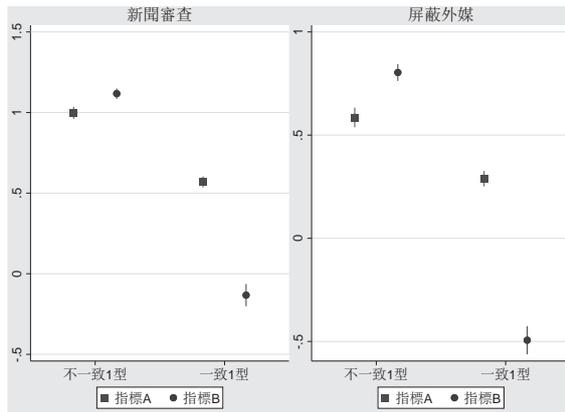
說明：關於信息價值的原始問題為：「有關國內外政治或政府方面的新聞信息，你認為目前接觸到的新聞和消息是不是很有價值？」備選項：-1=沒有價值；0=一半一半；1=有價值。圖中為均值，樣本數為2,028。

(四) 政治態度與信息認知

已有研究顯示，一般認知能力（即智商）與政治態度之間存在相關關係，認知能力較低的個體往往具有威權人格特質和社會支配傾向，在政治立場上更加保守，對少數派群體存在較強的社會偏見^⑨，而政治認知能力又會影響人們的輿論態度和政治行為（比如投票）^⑩。那麼中國網民的信息認知能力與政治態度之間是否存在相關關係？我們從媒體政策、外交和香港議題三個方面進行了考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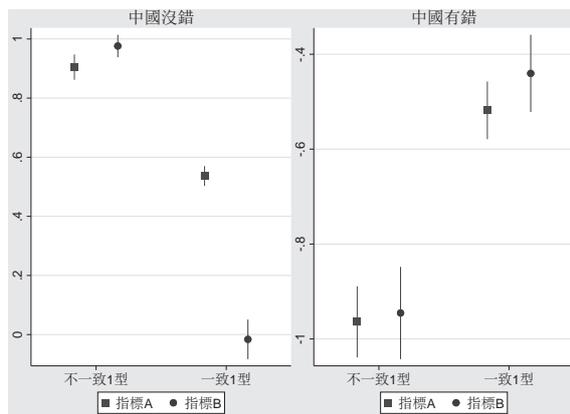
當被問及是否要對新聞信息進行審查、是否要屏蔽境外媒體時，認知不一致者和一致者的回答存在非常巨大的差異。認知不一致者在這兩個問題

圖8 媒體政策態度與信息認知



說明：關於新聞審查的原始問題為：「黨和政府對媒體播發的新聞進行事先的審查是完全必要的。」關於屏蔽外媒的原始問題為：「很多境外新聞和社交網站包含很多有害信息，必須屏蔽。」備選項：-2=強烈反對；-1=反對；0=中立；1=贊同；2=非常贊同。圖中為均值，樣本數為6,910。

圖9 外交議題態度與信息認知



說明：關於中國沒錯的原始問題為：「目前中美貿易戰完全是美國挑起的，中國沒有錯。」關於中國有錯的原始問題為：「美國對中國發起貿易戰主要是因為中國未能很好地履行WTO協議。」備選項：-2=強烈反對；-1=反對；0=中立；1=贊同；2=非常贊同。圖中為均值，關於中國沒錯的樣本數為6,910，關於中國有錯的樣本數為2,0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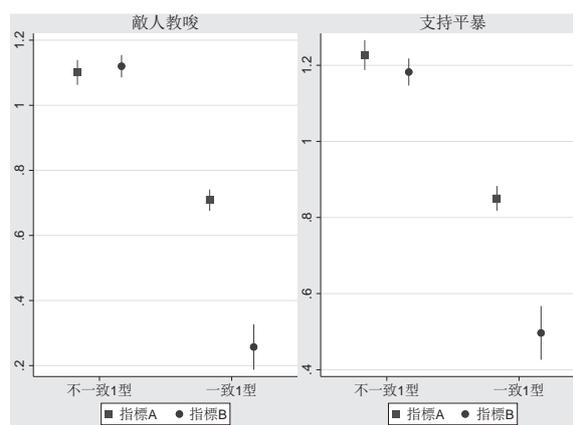
上均表達了明顯的贊同態度，而認知一致者在這兩個問題上則表達了明顯的反對態度(圖8)。這種截然相反的態度反映出中國網民在新聞審查方面的認知迥然不同，也表明中國網民中存在相當比例的人(認知不一致者)在民主內涵的認知上模糊不清，分不清真假民主的界限。

在諸如對中美貿易戰的問題上，認知不一致者與一致者之間同樣存在巨大的態度差異，而且認知不一致者比一致者的觀點更為極端。當被要求對「中美貿易戰完全是美方錯誤」這一觀點表達看法時，認知不一致者持明顯的贊同態度，而認知一致者持較為負面的反應。當被要求對「貿易戰主要是因為中國未能很好地履行WTO〔世界貿易組織〕協議」這一說法表達意見時，認知不一致者持強烈的反對態度，認知一致者雖然總體上也持反對態度，但反對程度要明顯弱於認知不一致者。綜合兩個問題可以發現，認知不一致者在外交議題上，相比認知一致者持更為極端的立場(圖9)。

2019年，香港社會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動盪，香港民眾發起反對政府修訂《逃犯條例》的抗議遊行並與警察爆發對抗和衝突。圍繞香港的遊行示威和警民衝突，中國大陸民眾也頗為關注，中國的官媒，民間的微博、微信等數字媒體也進行了大幅報導。當然，這些報導與香港本地媒體、境外媒體在事實的認定、政治傾向等方面存在明顯差異。對於絕大部分中國民眾而言，官方媒體以及官方嚴格管控之下的內地民間互聯網媒體，如新浪微博、微信公眾號是其了解香港問題的主要信息渠道。這些信息無疑會影響他們對香港問題的看法。當被問及對香港示威遊行等問題的看法時，67.77%的

網民認為主要是由於敵對勢力教唆，持中立或不知道態度的網民比例為21.75%，反對這一觀點的比例僅為10.48%。此外，71.17%的網民支持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對示威者和暴亂份子採取強硬對策，19.96%的網民持中立或不知道態度，反對這一觀點的比例僅為8.87%。這些統計結果表明，大部分的中國民眾對中央政府處理香港問題的態度和政策是支持的。對認知不一致者和一致者的比較可以發現，信息認知能力低的網民更加支持中央政府的政策，兩個群體的態度差異非常顯著（圖10）。

圖10 香港問題與信息認知



說明：關於敵人教唆的原始問題為：「最近發生的香港示威遊行主要是敵對勢力教唆的。」關於支持平暴的原始問題為：「堅決支持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對示威者和暴亂份子採取強硬對策。」備選項：-2=強烈反對；-1=反對；0=中立或不知道；1=贊同；2=非常贊同。圖中為均值，樣本數為6,910。

四 結論

現代民主政治的良好運轉需要很多必要條件，而公民素養是這些條件之一，也是形成現代民主所需要的公民文化和社會資本的基本構成要素。高水平的公民素養將減少制度運行成本、提高民主制度績效^⑩。但是現實世界中的公民素養並非與生俱來，而是人們在政治社會化過程中逐步養成的，不同的成長環境往往會造就不同的政治素養。在一些學者看來，美國的普通民眾並不具備民主制度所需的基本政治素養，他們不關心政治，也不了解政治，在眾多政治社會議題上的觀點也不穩定^⑪。在另外一些學者看來，美國民眾的政治素養可能未必那麼低，「9.11」事件之後美國民眾踴躍捐款、獻血等行為即是明證。在他們看來，即使公民素養比較低，也可以通過支持某個政黨組織來表達自己的政治訴求，只要知道自己的利益跟哪個政黨更接近就可以^⑫。美國的公民素養到底是高是低，在美國學界仍存在較大爭議^⑬，這些爭議足以表明公民素養對現代民主政治的重要性。

對高度複雜的政治世界的系統性理解，需要以基本的認知能力為基礎並通過長期的訓練和學習才有可能獲得。信息認知能力是公民政治素養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一個人能否理性思考和判斷政治、輿論事件的基本素質。邏輯推理能力構成了信息認知能力最基本的內核，是人們選擇、分析和評判信息的理性基礎。然而，由於先天的遺傳和後天的成長和生活環境不同，每個人在信息認知能力上的表現也並不相同。本文以普通網民為對象，對中國民眾的信息認知能力進行了考察，得出如下幾點結論：

第一，儘管超過77%的網民贊同媒體應該具有獨立地位和追求專業主義的價值，但是在現實信息渠道選擇和對媒體政策的態度中，卻有相當一部分人與自己的價值取向背離，出現了認知混亂的情況。認知不一致者在大學以下教育程度的群體中更為普遍，而接受了相同高等教育的人在認知能力上也存在差異，人文社科類專業者的信息認知能力相較於理工農醫類更高。考慮到網民（至少是回答本問卷的網民）相較於普通中國民眾而言，在教育程度方面更高，我們推測普通的中國人在信息認知能力方面會更低，認知不一致狀況更為普遍。從職業來看，大學教師、新聞記者、律師和大學生的認知一致性較高，而工人、農民、政府機構、企業職員的認知不一致性相對較高。相比認知一致的人，在信息認知上出現不一致的人在信息獲取渠道上更為同質化，對媒體信息抱有較為「天真」的想法，更傾向於認為新聞信息不存在被包裝和改編的事實。

第二，人們對政治社會問題的理性思考意味着對社會問題的邏輯性思考，意味着能夠分析各種信息和觀點彼此之間的邏輯關係。理性思考也意味着個體並不輕易接受未經審慎思考的某種觀點，不盲從於人云亦云的主流思想和流行看法。在人們愈來愈依賴於媒體來了解世界的今天，信息認知能力是公民素養和政治認知能力的基本構成要素，它很大程度上決定着成熟理性公民的成長。然而，在新聞媒體領域共用同一套價值體系的個體，並不意味着在現實的信息獲取和輿論議題上會持有相同的立場和觀點；相反，更為常見的現實是，相同價值支配之下的人們由於信息認知能力的差異而導致在眾多輿論議題上出現巨大分歧。不僅如此，我們的調查還顯示，認知能力較低的民眾並不是不關心政治、不參與信息傳播和輿論的塑造，而是塑造輿論和傳播信息的重要成員。在這個「人人都有麥克風」的新媒體時代，當缺乏最基本的理性思考能力的民眾成為輿論塑造者和信息傳播者時，能否形成高品質的公共輿論就成為一個無法迴避的現實問題，中國網絡輿論很可能出現「雞同鴨講」的無法對話的局面，民粹主義、民族主義等偏激思想和「網絡暴力」、「罵大街」等極端言行將大行其道，而理性的聲音則可能受到瘋狂攻擊而退卻和沉默。中國網民信息認知能力現狀表明：中國民眾的政治認知能力乃至公民素養的提高、成熟的公共輿論場域的形成仍然任重道遠。

第三，為甚麼有些人在信息認知方面會發生自相矛盾的表現？人們一般會把這種不一致歸因為出於利益或者安全的考慮而違背了自己原初的價值和信念，但情況可能並不如此簡單。本文的統計分析揭示出，認知一致者和不一致者在政治興趣、瀏覽新聞的時間和輿論關注度等方面並不存在顯著差異，這些結果提醒我們，大量以西方國家民眾為對象的研究結果顯示，認知一致和不一致性既有認識論上的根源，也有心理動機和人格上的根源。同時，認知不一致的表徵和根源還具有跨文化的差異^⑤。中國人的信息認知不一致是否導致了政治、經濟等領域的認知混亂？中國人的信息認知能力的形成具有何種普遍性和特殊性？這些問題將在後續研究中展開分析。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信息認知能力的測量以基本的邏輯推理能力為基礎，但並不僅限於此。信息獲取渠道的多樣性和難易程度、對媒體框架的識

別能力、對信息內容的解讀能力等，均可以成為信息認知能力的衡量指標。因此，本研究對個體信息獲取渠道的異質性、對信息框架的看法等相關問題的考察，從更為寬泛的意義上來看，均可以作為信息認知能力本身而非信息認知的後果來看待。由於無法進行概率抽樣，並且因經費所限，本文所做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存在無法代表整個中國網民群體的可能性，更不能理所當然地推廣至所有中國普通民眾。同時，由於樣本數量所限，本文並未就信息「認知不一致2型」和「認知一致2型」的情況做分析，此缺憾有望在後續研究中彌補。雖然在信息認知能力的測量指標體系的設計、問卷執行、樣本抽樣等方面亦存在不足，但考慮到當前在中國大陸開展此類社會調查的難度，本研究作為一項探索性研究仍具備一定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

註釋

① 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著，閔克文、江紅譯：《公眾輿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② 參見Robert C. Luskin, "Measuring Political Sophistic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1, no. 4 (1987): 856-99; Stacy B. Gordon and Gary M. Segura, "Cross-National Variation in the Political Sophistication of Individuals: Capability or Choice?",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59, no. 1 (1997): 126-47; Ting Yan, "Political Sophistication among the Mass Publics of Confucian Asia", *Asian Politics & Policy* 1, no. 1 (2009): 97-112; Ryan L. Claassen, "Political Awareness and Electoral Campaigns: Maximum Effects for Minimum Citizens?", *Political Behavior* 33, no. 2 (2011): 203-23; Robert N. Lupton, William M. Myers, and Judd R. Thornton, "Political Sophistication and the Dimensionality of Elite and Mass Attitudes, 1980-2004",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77, no. 2 (2015): 368-80。

③ Rebecca Weitz-Shapiro and Matthew Winters, "Can Citizens Discern? Information Credibility, Political Sophistication, and the Punishment of Corruption in Brazil",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79, no. 1 (2017): 60-74。

④ 參見David M. Condon and William Revelle, "The International Cognitive Ability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Initial Validation of a Public-domain Measure", *Intelligence*, vol. 43 (March-April 2014): 52-64；李德明、劉昌、李貴芸：〈「基本認知能力測驗」的編製及標準化工作〉，《心理學報》，2001年第5期，頁453-60；程灶火等：〈華文認知力量表的信度和效度分析〉，《中國心理衛生雜誌》，2007年第2期，頁103-106。

⑤ 例如，著名媒體人胡舒立就強調新聞媒體首先要堅持新聞專業主義——用專業、客觀、公正的手法報導事實。相關信息可參考胡舒立在2013年第十四屆北大光華新年論壇的發言視頻以及其他相關報導。

⑥ 長期以來，「黨管媒體」在中共的新聞輿論工作中一直是首要原則。這一原則在近年來得到了進一步強化。在2016年2月19日舉行的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講話中提出：「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堅持黨性原則，最根本的是堅持黨對新聞輿論工作的領導」，「黨的新聞輿論媒體的所有工作，都要體現黨的意志、反映黨的主張，維護黨中央權威、維護黨的團結，做到愛黨、護黨、為黨」。參見〈堅持正確輿論導向 唱響時代主旋律——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引起強烈反響〉(2016年2月20日)，新華網，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2/20/c_1118106502.htm。

- ⑦ 孔達 (Ziva Kunda) 著，周冶金等譯：《社會認知：洞悉人心的科學》(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2013)，頁 156-93。
- ⑧ 參見麥庫姆斯 (Maxwell McCombs) 著，郭鎮之、徐培喜譯：《議程設置：大眾媒介與輿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Amos Tversky and Daniel Kahneman, "The Framing of Decisions and the Psychology of Choice", *Science* 211, no. 4481 (1981): 453-58; Robert M. Entman, "Framing: Toward 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d Paradig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 no. 4 (1993): 51-58; Dennis Chong and James N. Druckman, "Framing Theory",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0 (June 2007): 103-26。
- ⑨ Gordon Hodson and Michael A. Busseri, "Bright Minds and Dark Attitudes: Lower Cognitive Ability Predicts Greater Prejudice through Right-Wing Ideology and Low Intergroup Contact", *Psychological Science* 23, no. 2 (2012): 187-95; Noah Carl, "Cognitive Ability and Political Beliefs in the United State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vol. 83 (September 2015): 245-48; Becky L. Choma and Yaniv Hanoch, "Cognitive Ability and Authoritarianism: Understanding Support for Trump and Clinton",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vol. 106 (February 2017): 287-91.
- ⑩ David J. Lanoue, "One That Made A Difference: Cognitive Consistency, Political Knowledge, and the 1980 Presidential Debat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6, no. 2 (1992): 168-84; Noah Carl, "Cognitive Ability and Political Beliefs in the United States", 245-48; Becky L. Choma and Yaniv Hanoch, "Cognitive Ability and Authoritarianism", 287-91.
- ⑪ 阿爾蒙德 (Gabriel Almond)、維巴 (Sidney Verba) 著，徐湘林譯：《公民文化：五個國家的政治態度和民主制度》(北京：東方出版社，2008)；帕特南 (Robert D. Putnam) 著，王列、賴海榕譯：《使民主運轉起來：現代意大利的公民傳統》(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 ⑫ 參見 Philip Converse, "The Nature of Belief Systems in Mass Publics", in *Ideology and Discontent*, ed. David E. Apter (New York: Free Press, 1964): 206-61；扎勒 (John Zaller) 著，陳心想等譯：《公共輿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
- ⑬ James N. Druckman, "The Implications of Framing Effects for Citizen Competence", *Political Behavior* 23, no. 3 (2001): 225-56.
- ⑭ 美國的《政治行為》(*Political Behavior*) 雜誌曾經集中發表了幾篇探討公民能力的文章。參見 James H. Kuklinski, "Citizen Competence Revisited"; Jeffery J. Mondak and Belinda C. Davis, "Asked and Answered: Knowledge Levels When We Will Not Take 'Don't Know' for an Answer"; James N. Druckman, "The Implications of Framing Effects for Citizen Competence"; Robert Weissberg, "Democratic Political Competence: Clearing the Underbrush and a Controversial Proposal"; James H. Kuklinski and Paul J. Quirk, "Conceptual Foundations of Citizen Competence", *Political Behavior* 23, no. 3 (2001): 195-98, 199-224, 225-26, 257-84, 285-311。
- ⑮ Etsuko Hoshino-Browne, "Cultural Variations in Motivation for Cognitive Consistency: Influences of Self-Systems on Cognitive Dissonance",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6, no. 2 (2012): 126-41; Steven Heine and Darrin Lehman, "Culture, Dissonance, and Self-affirma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3, no. 4 (1997): 389-400.